

东方世界当代崛起之大数据探密

前言

第一节 耶利问题和学伟问题并三个世界的新定义

第一小节 耶利问题和学伟问题

我先来解释什么是**耶利问题**。耶利是地处东南亚最东端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当地土著的领袖，在领导他的人民在他的土地上赢得独立之前，他很不明白，也显然很不服气地向一位在当地长期工作的西方学者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欧洲人创造了那么多的货物（goods）而其它地方的人创造的那么少？”这个问题在1972年被提出。到25年后的1997年，这位西方学者，人类学家嘉瑞德·艾蒙德写了一本长达570页的名叫《钢铁、枪炮和细菌》^①的书，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再概括一点，就是：**环境决定发展道路，与智商无关。**

这个环境因素，他讲得十分地全面，但最核心的精神是所处环境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这方面欧亚大陆尤其是亚洲西部，**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地带，得天独厚，所以就先发展了。

我当然觉得这个结论是过于**矫情**了。环境自然会严重地影响到文明发展早期的道路选择。但在类似的环境中，成长出来的文明却可以大不相同。（比如同在新月沃土周围成长出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可是与其它的东方文明大异其趣。）而且现在的动植物资源乃至先行的西方文明的所有基础性的发明创造（比如电动机、内燃机、公路铁路航空交通、比如电脑、互联网），早已是全球共享。那现代的那些同样后起的各个民族的不同的发展速度、程度的区别又从何而来呢？而且这种不同的发展程度、速度呈块状群体分布。这并不能用应当以国家为单位的治理水平的不同来解释。（就说，你无法解释那么一大群挨在一起的国家的治理水平为什么都不好或都好。）

那么我这本书试图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笔者先斗胆把这个问题也起个名字，叫做**学伟问题**。它的完整阐述比耶利问题长一点，有如下关于经济发展和西式民主两段：

关于经济发展：（在可以预见的时段内，）在亚、非两大洲，不靠石油，为什么只有东北亚的中、日、韩三个民族（日本+四小龙+将来时的中国），可以臻至发达、现代化？相应地，除了东北亚、除了产油国，为什么亚、非两大洲（第三世界、南方世界）就没有一个发达富裕（定义：人均两万\$以上）的国家？

关于西式民主：同样地，在亚、非两大洲，为什么成功复制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

^①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Jared Diamond,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1997.

政体仅有寥寥三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①），而且它们都在东亚（东北亚）？相应地，除了东北亚，在亚、非两大洲（第三世界、南方世界），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一个发达富裕的西式民主国家？

其实，答出了第一个问题，同时也就基本上答出了第二个问题。因为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发达富裕，也就不可能有发达富裕的无论哪种式样的现代民主国家。因此，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就是：**在非西方的世界里，为什么只有东北亚的中、日、韩三个民族，已经（或有把握）追赶西方成功，建成现代化的国家？**（这里，已经把那些比如阿拉伯半岛上的产油富裕君主国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我认为那些国家无论多么富裕，都不能算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因为它们始终是依附于其它那些真正的现代化国家的。）

笔者还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可以解释更多的问题。本人花费数年的光阴，研究了浩繁的数据，也不应当仅仅限于回答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都是正反各一对，其实是四个问题了。事实上，本书对以下一系列的问题都有解答，而且是一个统一相关的解答。

第五、东北亚以外，非产油的非西方国家中，发展到半发达状态（人均1万\$上下）的极少数国家（比如南非、土耳其），为什么必与欧洲文明深切相关？

第六、为什么拉美的发展会介于发达西方和除东北亚之外的其它亚非国家之间？

第七、在东北亚之后，东南亚为什么似乎会比其它亚非国家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第八、同在东北亚，比起中国台湾、韩国，中国的人均收入（先且不与日本相比）为什么会至今落后不小的一截？或者再扩大一点，为什么越南、老挝、柬埔寨比起它们的东南亚邻居，经济发展水平同样落后不小的一截？或者再扩大范围，为什么东欧的发展，比起西欧也有明显差距？

第九、作为反题，为什么上述那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尤其是其中地处东亚者，更尤其中国，近年来（都）表现出一种令世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超级的而且持续的发展速度？

第十、在非西方世界，除了东北亚，为什么较多的西式民主（比如印度）并不能像西方世界那样与富裕并行？为什么西式民主在东北亚以外的非西方世界的含金量会小那么多？

第十一、为什么亚洲非洲的产油国的巨额财富也带不来西式民主？

第二小节 三个世界的新定义

为了让大家对我的问题理解清晰，笔者现在接着来解释一下自己的有些独创的三个世界的新概念。

三个世界的说法通行已久。在冷战时代，**第一世界**自称**自由世界**，当然就是**西欧北**

^① 中国一部分，但拥有单独关税地位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将不断地出现在本书中。为了不与其它国家混淆，笔者将把它们称作政体。其它国家也是政体。两者混合时，也称政体。如果不混合，则称国家。

美澳洲之意。**第二世界**则是指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苏联集团-华沙条约集团**，现在得称是**前苏集团**了。余下的几乎统统处于发展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则号称**第三世界-亚非拉-发展中世界/国家**。

在 1950-1960 年代，这个划分唯一的不妥之处就是日本。它显然身处亚洲，属于华夏文化圈，却的确已经发达，且有着与西方类似的政治制度。到了 1970-1980 年代以后，接着发展起来的东亚四小龙的身份也尴尬起来。因为它们也已经那么富裕，如何可以继续称之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政体**？

到了 1990 年柏林墙倒塌，东欧集团瓦解，除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个国家以外，其余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奋不顾身地排队先后投入了欧盟的怀抱。冷战时代的**第二世界**不复存在。

第二世界不再存在，**第三世界**的称呼就失去了逻辑性。但是事实上大家依然在继续使用这个**第三世界**的称呼。那么到哪里去找这个前苏集团遗留下来的**第二世界**头衔的继承者呢？现在笔者在本书中就想来完成这个任务。下面本人开始第一次简略陈述自己的三个世界的新概念。

我们这个地球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下一级的属概念其实最准确的是文明。但是笔者下面要划分的世界有些会跨越几个文明，因此并不方便称之为三个文明。好在三个世界的提法流行已久，笔者借用它，不会显得突兀，只是需要注入自己的确切新定义即可。

这**第一世界**就是**西方世界**。这个概念十分传统，一直就是欧洲美洲澳洲。

新颖一点的有两处。第一是东欧，包括现在的俄国，都属于这个笔者重新定义的西方世界。虽然俄国现在与传统的以西欧为渊源的西方还有些格格不入，但是从长远的历史看，它只能属于西方。它现在已经近乎完全被孤立，已经很难自称一个单独的文明了。

第二点就是笔者把拉丁美洲也划入西方。理由是它的确也无资格自立为一个文明。不把它划入西方世界，还能划入哪里呢？有人会说，因其发展程度较低，一贯上它都被划入**第三世界**。你怎么把它改了？这个事情后面会反复解释，直到结论。这里暂且打住。

为了让西方世界的这三个细分更有逻辑性，本人从此把传统的发达西方称作**西方 1**、拥有计划经济负遗产的东欧称作**西方 2**，拉丁美洲称作**西方 3**。

下面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亚洲+非洲）合在一起，就是**非西方世界**的地盘。

第二世界就是**东方世界**。这里就是一个总的文明，本人把它称之为**东方文明**。它覆盖的区域是所有亚洲东部，是同一个种族的人居住的地方，简称东亚。在其下，笔者还划分了**富裕东亚**、**前公东亚**和**其余东亚**三个子区。

富裕东亚就是日本+四小龙。这五个政体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 2 万\$，比起发达西方，还是稍有逊色，但比起所有非西方世界的非产油国，那都是奇迹。

前公东亚是指那几个曾经施行过**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东亚国家。这样的国家一

共有六个。现在除了朝鲜都已放弃全盘公有制/计划经济。自此以后，这些国家都出现发展飞跃。

其余东亚就是剩下的五个非富非公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发展成绩参差很大。

如同对西方世界的细分，本人把富裕东亚称作**东方 1**，前公东亚称作**东方 2**，其余东亚称作**东方 3**。当然如果只按素质分，则整个东北亚+包括中国，可称为**素质东方 1**，其余东亚可称为**素质东方 2**。按具体场合，我将分别使用这两种分法。

第三世界笔者称之为**南方世界**。这里包含三个子区，其实是三个文明，就是**南亚文明**、**中西亚北非文明**和**撒南非洲文明**。

这三个文明解释起来都有一些困难。

比如**南亚文明**。这里有至少三个不同的主导宗教，捏合到一起主要是明确的地理的因素。的确它们共居印度次大陆，还是有很多共同的发展特点。这些都要等后面细说。

对于**伊斯兰文明**，要补充一句，这里仅限中亚、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国家。地处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不包括在内，因为他们与前述的伊斯兰文明第一地理上不毗连，第二人种也不一样，因此那里的东南亚性格更明显。西方人习用的称呼**中东**对本人觉得太过的西方中心主义，因此不取。

比如**撒南非洲文明**。这里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一直有争议。英国的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认为它先后从属于古埃及文明、中世纪阿拉伯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亨廷顿则犹豫要不要给它一个独立文明的名分。我把它称作第三世界的一个子区，也是像南亚一样，依从明显的地理和人种划分。这里的国家当然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也以后细说。

把这三个地区划在一起，称第三世界的做法，倒是继承了以前已被普遍接受的第三世界的定义，就是发展中世界/国家，加上不够发达甚至不发达世界/国家之意。但是已不是以往通行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把东亚划出去单立一个东方世界的山头，理由当然会很充分。本书会徐徐道来。最根本的依据自然是，东方世界的一部分已经很发达（日本+四小龙），一部分显然很快就会发达起来（中国），剩下的部分（首先是马来西亚）也有很大的发达起来的希望。

把拉丁美洲划出去，首先是因为在血统上、文化上，那里的人民的确大半是欧洲人的后裔。同时也是因为它已经半发达，和上述南方世界三个子区的基本情形实在相当地不同。当然细节都有待后叙。

再明确一下，本书所称的第三世界-南方世界，在地理上仅限于**除东亚以外的亚洲和非洲**。按照现今的发展水平和潜力，本人把南方世界的三个部分也排一下序：西亚北非的穆斯林世界称作**南方 1**，南亚的 6 个国家合称**南方 2**，撒南非洲称**南方 3**。

其实，即使把拉丁美洲留在第三世界-南方世界的范围内，我的那个问题的提法和结论都不会改变。在那个完全符合传统的非西方世界-亚非拉第三世界里，依然是东北

亚一枝独秀，依然是除东北亚之外，不靠石油，没有一个国家发展到发达（人均2万\$以上）。不过西方人认为合格的西式民主国家呢，则会多两个，（虽然人均收入上还有欠缺，国家也都只有几百万人口。依我的说法，则是次级西式民主。）在拉美。这些后面当然还会细说。

唐人孟浩然留下过一首诗，正好可以表达本人此时的感慨：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苏联的业绩，已成丘墟。而我们华夏人的业绩，则正待开创。笔者现在要去登临的胜迹，全在电脑中。不过它们可不是虚拟，而是人类切切实实走过的历史的足印。这期间的风云激荡，实在可以让人心旌摇曳、目眩神迷。找出其间别人没有看见或看清的真实路径，则是本人的雄心壮志。

第二节 五个方法论

西方的学术史上有一个极为著名的佳话：为了研究城邦制度，古希腊最卓越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发动他的学生，考察了数百个城邦，一共写成了一百多篇各论一个城邦的政治史的论文。亚氏也亲自写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就是大名鼎鼎的《雅典政制》。然后他以这一百多篇论文为基础，写下了他那名垂千古的政治学巨著《政治学》。从这一本巨著中，笔者不仅学到了他的结论，就是“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还学到了他的方法，就是从实践出发，从无限丰富的历史的和当代的政治实践中去概括规律。他用的**归纳法**。

据笔者观察，西方的政治哲学，真的是有两类，第一类笔者称之为**亚里士多德式**的，因为如上述，亚氏是这类理论的鼻祖。他的理论是从众多繁复纷纭的政治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有着无限的丰富性。这种理论特点在近世发扬光大。比如笔者觉得马克斯韦伯，熊彼特等人的现代西式民主理论也有这种特色。就是说，他们用的是归纳法，他们建立理论的基点是已有的政治实践，他们首先想的是从实践中概括出规律，然后试图修正现存制度的缺陷。从凯恩斯开始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积极干预）和从撒切尔里根开始的新保守主义（主张减少国家干预）都属于这一类。他们不再祈求自然法（天赋人权）作为其理论的基石。实在是现实已足够丰富，无须那些相当理想主义甚至多少天真的说法作为出发点了。

另一类理论笔者称之为**欧几里德式**的。它们总是想先建立几条有数的公理，然后由此演绎出整套理论体系。类似这样的理论体系似乎数量更多，势力也很大。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是这类理论的典型代表。美国独立宣言中有关人权的那一段著名的话——（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则是这类理论的最著名代表。笔者绝不想否认，这类理论的重大历史乃至现实意义，虽然本人更倾向于归纳法，认为那种方法论更接近于科学。笔者还是愿意折中地认为，两种方

法论的结合，应当是接近真理的更好途径。

除了归纳法，笔者崇尚的另一个基本方法论是，研究任何一个复杂的事物，乃至观念，一定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有起源、发展、兴盛然后衰落乃至灭亡的过程。比如世界的民主运动，我们应当看到它不是一个先于经验的真理，而是一个在实践中摸索创立的过程。以为有一种施诸万代而皆灵的政治制度先验地存在，实乃荒诞不经。

这个以黑格尔为首的德国哲学家们总结出来的过程和发展规律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而皆灵的永恒真理。

笔者服膺的第三个方法论是：除了人要吃饭睡觉之类的简单真理外，任何稍微复杂的真理，都会需要条件。如果动不动就要标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不是科学，而是迷信，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信仰。

从法国的年鉴学派，笔者还学到一个方法论，就是：研究历史，要看重那些在较长的时段（至少几十年）内发生的社会变迁（比如工业化、城市化、第三产业化、中产阶级的扩张），而不要过分看重政治舞台上绚丽的表演。这些表演如果表达了深层的社会变迁，则有重大历史意义，反之则无。笔者以为，这个年鉴学派，其实是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较疏远的流派。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人类认识社会的最伟大建树之一。

最后，到十分晚近，笔者才发现其实自己还有第五个方法论，就是中庸-中道，无过无不及，不走任何一个极端，总想在对立的意见中寻找折中的真理。

概括起来，笔者的基本方法论有五条：第一，实践主义，主张用归纳法去寻找政治真理。第二，历史主义，主张研究问题看过程，看发展。第三，条件主义，相信任何复杂的真理的存在都有条件。第四，背景主义，主张通过对深层社会变迁的研究来理解表层政治变革的真正意义。第五，中庸主义，认为真理通常都处于对立意见的中部。

第三节 继续解题

第一小节 大数据挖掘的定义

接着来介绍一下有关大数据挖掘的一些基本知识。大家只要把这五个字在电脑上键入任何搜寻工具，就会赫然发现，这个概念很是热门。至于笔者，对大数据（Big Data）这个词早已是耳熟能详，虽然这个词的出现也十分晚近。它指的是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人工，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截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人类所能解读的信息。

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只有数十年的历史。它们的出现与相关处理技术的发展，都与 IT 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事实上，只有使用电脑，才可能生产出如此巨量的数据，和对它们进行有效的处理。而这些数据的庞大程度，也与电脑存储与计算能力的发展一起与日俱新。

海量的数据出现以后，人们很快地发现一种“数据丰富，但信息贫乏”的困境。那些大量的数据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变成了“数据坟墓”，人们会在其中迷失方向，如同进入一座没有地图的城市，或没有道路的原始森林，无法进行有效的访问。

人类是在挑战与应战中进步的。有了困境，人们自然就会去开发战胜困境的办法。

数据挖掘(英语: Data mining, 简称 DM)。它是数据库知识发现(英语: Knowledge-Discovery in Databases, 简称: KDD)中的关键一步。

这方面的研讨现在已经蔚为壮观。已经有了很多次的专题国际研讨会，也有好些种专业国际期刊在发行。也有好些本专业教科书或 PPT 教程在网上就可以查到。读者如有空，至少可以去看一两个 PPT 教程，不会花很多功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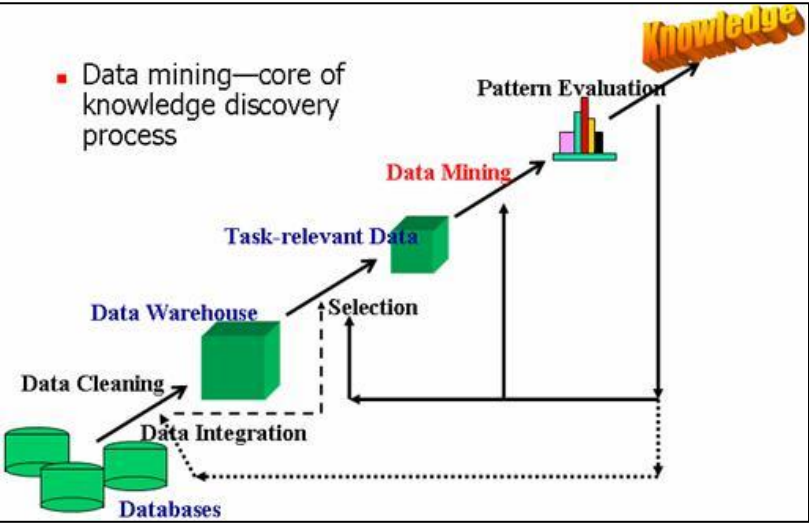
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不一致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有时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①。

数据挖掘的大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首先是在一个预定的范围内收集原始数据，建立数据仓库。

第二步是整理数据。把不完全的地方尽量补全，把“噪音（无效的数据）”排除，把模糊的地方尽可能地弄清楚，把不一致的术语尽可能地统一……。

第三步对数据进行预处理。比如用两个数据之差和积商或更复杂的变换产生第三个更便于处理的新数据。



第四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数据挖掘，或者说对已经处理过的数据进行分析吧。本书大量使用的就两种方法：一个是**比较**，把各种可能相关的数据集进行广泛的比较，找出那些有强相关性的数据组合，并努力去寻找导致这种强相

关的原因。有时相关性甚强，但呈非线性。这时就要找出非线性的原因。第二个是**分类**。有价值的数

① **信息**和**知识**是**数据**被提炼后组织化程度提高的两个阶段。数据是原始的、大量的，一般人无法接触的（比如某商品在无数机构的具体成交价格）。信息（比如某商品的平均市场成交价格）则是一般人可以理解、也可以运用的。知识（比如某商品的价格的涨落变化规律）则又是一般人难以捉摸的了。

据有效地进行分类，而这些分类可以说明很多的问题。

如果找出了这种强相关的数据组合或有效的数据分类，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分析结果“有趣（interesting）”。这些结果自然就会被保留下来，就如同挖到了有用的矿脉。如果总是“无趣”，自然就得放弃，就如同挖了一通都是废石或含矿品位太低。

实事求是地说，挖了好久，最后因收获太少，被迫前功尽弃的几率可是相当的高。因此经常需要再回头重复前面几个步骤，（寻找新的矿山、新的矿脉、重新在其中试掘有用的矿石。）直到找出足够多的有趣结论，就如同采集到足够多的有用的矿石。（这就是上图中右下方那几条回头的箭头实线乃至虚线的意思。）

第五步是用这些确定有趣的结果来建立模型。然后用这些模型来解释现状和对将来的行动提供依据或建议。这样，海量的原本看不出什么意义的原始数据就变成了有用的知识。

本人把本书使用的数据总和称之为大数据应当不算夸张。毕竟它的主题外延是整个人类政治加经济社会，158个国家、10套数据、121张数据分析图、18张大型表格、7张小附表和11张照片之多呢。（晚一些再重数。）

对三个世界的解析围绕着经济发展与政治上的民主两个主题进行。因此这里要先对这两个名词明确定义。

第二小节 民主与发展的定义

民主（democracy）这个词，的确来自西方。在中国汗牛充栋的古籍中，从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到全部二十四史，的确完全找不到以**人民主权-主权在民**（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来做解释的民主概念^①。其实民主或人主这个词，在中国的古籍中并不罕见，但它的意思正好与 democracy 相反，说的是人民的主人，不过这个民之主，正统的解释是“**为民做主**”，倒也不仅是要自己作威作福。

在网上查询，意外地发现，在中国的古籍中并没有今天是如此常用的**发展**^②（development）这个词。它似乎也是在近代中才传入中国的外来词，看那模样，很可能来自日本。历史上的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的农耕文明状态，的确是发展缓慢，要以千年，至少是数百年为尺度，才能看出（经济、社会 and 科技乃至政治）发展的明确印记。现在这个无时无刻不是处于迅疾变化中的世界和时代，也的确为西方近代的工业革命所开创。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发展成为人类生活的主题，也是来自西方。

在本书中，与民主对称，笔者将不断地使用发展一词。当然政治（制度）本身也必

①中文的**主权**一词没有西文的 **Sovereignty** 分量重。因为在华夏文明数千年的传统中，这个政治主权从来都毫无疑问地归于政府-皇家。华夏人民能够拥有的最大权利是人身自由和财产的所有权。中国曾有债务奴隶，但数量很少。中国从未像古代甚至近代西方人那样大规模役使奴隶。

②找到的最早出处：晚清小说《孽海花》第二八回：“他们兄弟俩，各依着天赋的特性，各自向极端方面去发展。”

是在不停地发展。但本人在此约定，若非特别指出，本书中单独使用的发展一词，首先是指经济的发展，然后是指社会（包括文化、教育、除政治制度之外的一切制度）的发展，但不包括政治（制度）方面的发展。政治方面的发展是本书的另一主题，它会被不断地单独论及，不会被忽略。

而发展这个主题，在那动乱的年月，自然无从提起。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恢复真正内部和平以来，发展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主题之一。很可惜那前 28 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浪费了中国不少的发展机会。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就成了中国的一切变化的主旋律。

本书现在的第一主题，是东亚/中国在世界三个框架内的崛起。本书使用的第一分析工具将是国民综合素质。本书将主要用这个工具来平行、交叉地反复探讨经济发展和西式民主两个主题。经济发展的探讨则有人均收入和长期发展速度两个主要观察点。

第三小节 主题的演变

一个学者的良心告诉我：必须尊重事实。不可以曲解事实去屈从自己钟意的理论。必须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去丰富、或去修改、甚至去否认自己的理论。不得已时，你可以回避一些事实，一些理论。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一定不可以捏造事实，更不可以在这种捏造的事实的基础上，去总结一些必然也是捏造的理论。

笔者也是凡人，不可能完全避免观察错误，也不可能保证自己的逻辑归纳就万无一失。只能保证自己有一颗追求真理的正心。为了维护这颗正心，笔者已经无可避免地忍受着同时抗拒着不少的约束。

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日益加深地体会到：首先，政治制度（包括西方式的和非西方式的）不可能在真空中，仅仅依赖意识形态来发展。它必然有一个经济的、社会的和 cultural 的发展环境或称背景。笔者发现，这不同的概言之的三重背景对政治生活的形式和政治制度的演进有着一个极大的约束力。因此笔者在本书中对政治制度的分析，可以说无处不与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背景相连。如果不对这些背景有足够的描述和分析，其实你并不能真正理解政治、制度演变的原因和方向。

其次，笔者还发现，政治其实还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真正核心。不谈政治，不谈政治制度的类型和演变，人类各文明也一样有许多动人心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值得论述。

小说家告诉我：自己写的书中的人物可以有自己的逻辑，有时并不听从作者的使唤、安排。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理想追求，与作家本人的初衷并不一定会始终一致。以前本人对此话是感觉难以置信。今番笔者在编纂本书的过程中，也真的体验了一把这种相当让人尴尬的事态。

本书本来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就是西式民主。在本书编撰的过程中，接触到的大量证明东亚地区正在崛起的数据，就是这种与政治并不直接相关的，依然可歌可泣的发

展故事。本人实在情不自禁，不断地在增加这部分的内容。到得最后，这种类型的内容几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分量。经与出版方相商，直接把本书的名字改成《民主与发展的大数据挖掘》，以免文不对题。如此一来，又发现在发展方面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在本书的第二稿中，已经试图尽量弥补。弥补的结果就是，到头来，两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是一半一半。

到得出版社正式审稿之时，得到的反馈是第二稿依然有很多问题。一是学术方面，书稿还没有达到比如博士论文的严谨与规范的程度。二是政治方面，还有很多不成熟、不规范和不方便的提法。比如前述关于宗教。现在的第三稿，已经又是大动干戈，把数据、图表几乎全部换过，组织结构再次大加调整，各方面的各种意见都努力采纳之后的最新成果，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够达到标准，终究顺利与读者们见面了。

结构一再变动以后，西式民主与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是第一级的划分章节的依据。根据显然更偏向于地缘政治的新的整体结构，笔者构想了这个新的书名，希望大家喜欢。

第四节 关于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

个人认为，政治，当然是人类组织社会的集体生活的最高的一种形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每一个团体都追求一种善。而城邦则追求至善。”^①

但是，在政治之下，其实还有着丰富得多，实质得多的社会的、文化的、尤其是经济的生活。（当然还有家庭的、个人的生活等。本书不准备讨论到那么深入。）它们是人类存在形式中更基础的部分，其实也是更重要的部分。它们同时是社会的更形而上的部分的基础，就像楼房的地基和底下的楼层。而（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政治结构（以及建构它所依赖的意识形态）真的是这个整体的文明结构的最高楼层。它的确有能力统帅其它层。（所以它非常重要。）但它必须以其其它的楼层为基础，并为其它的楼层服务。如果没有这个意识，而是以为整个社会都应当为某种政治、或某种意识形态服务，这必是一种暴虐的政治（意识形态）。

宗教的地位则与政治相类。不过本书不会讨论宗教问题。原因前面已述。

为了提纲挈领，这里先把关于发展方面本人达至的一些基本结论作为“大胆的假设”在这里先行提出。以后再慢慢地论证。

首先：本人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间，没有一种刚性的，单向的因果关联。就是说，不能认为政治是因，其它比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果。不能认为其它一切的发展，都是由政治（制度）的类型或其发展所限定或确定的。说到底就是说，无法论证，在某种（政治）制度形式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一定会好，或一定会坏。

所谓“路线是个纲，其余都是目”的说法，是标准的历史唯心主义，本人完全不取。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原话有一大段，这里概括的是毫无疑义的大意。

那个“人生而平等，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诸般权利.....”，并据此建立制度，然后要推行到全世界，说来也是类似的历史唯心主义。^①

其实，倒是如果把上述立论反过来，可以得到多得多的现实的支持：**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现实的基础，会极大地有利于、相对地有利于、相对地不利于甚至极大地不利于某种类型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自上而下的影响和自下而上的约束都是存在的。但自下而上的约束远远大于自上而下的影响。用中国的一句俗话来说就是：**通常总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政治就是胳膊；其它的一切，就是大腿。胳膊拧过大腿的事态也确实发生过。但它们都经不住历史的考验。最多数十年过去，大腿就会把胳膊重新拧回来。

这和一般人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可能不符。但如果你能站得高远，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长时段的生活（数十年就行），你会发现，这是真理。比如请你想想，为什么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会被放弃了呢？是不是大腿又把胳膊拧回来了？

这套观点其实并不新奇，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笔者的感觉，冥冥之中，还是自有天道。只是为了寻到这个天道，有时人类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耗费的时间也太长。迷途之长，可能超过一个人的整整一生。

笔者发现，社会的变迁中有太多的自然的，非人力（尤其是一时的，有意识的，政治的人力）可挽的因素。社会当然是由人构成的，但**社会的运动，很多时候是由广大的人群凭借下意识的本能在运动。**（比如中国改革开放 35 年来的造富运动。）**领袖们担负的只是开启阀门的责任。但闸门打开后，有多少水可以、可能或成功地流出来，则是在漫长得多的历史中积淀而来，不是一代领袖所能真正左右的。**（比如中华民族在当代中国和全世界各地表现出来的经商和科技才能。）（1990-2010 年代的西方资本势力全力支持的经济全球化，可作如是观。西方当年的殖民运动，也可作如是观。）

有一个说法叫做**历史的迷雾**。说的是人们的认识很容易被困在当下。错非有大智慧的人，无法透过历史的迷雾，看清现在许多事情的对错，更难清晰地看到将来。但数十年，上百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过去，就容易得多，因为他只需要归纳确凿的过往事实即可得到相对可靠得多的结论。

这些自己得到的结论，经反复考量，还是决定在陈述证据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举证

^① 稍微说详细一点，我的意思是：《五月花号公约》、《美国独立宣言》，也是建立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基础之上。（比如，如果有一群中国人或阿拉伯人要在一个蛮荒之地殖民，他们的会起的章程肯定与欧洲人的不一样。）那些似乎的公理，其实并不是天授。它们并不可能简单地、先验地“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而皆灵”。

有人肯定会说，那不同的理念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适合于不适合之分。要改造制度，必须先改造社会。否则就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橘移淮北则为枳。甚或邯郸学步，反失本步。

结束以后，再行完整归纳。

第五节 民本与民主/民意与民心

西方意识形态在民主这个概念上太过强势，由他们定义的民主的第一要素就是符合西方标准的普选，第二要素就是执政党的轮替。没有这两个标志，他们都不承认是（西式）民主。

这种定义造成我们在讨论非西方的民主时的困难。比如在讨论现实的中国制度民不民主时，双方就陷入了无法达成基本共识的困境。中国学界和官方的说法是中国现在的制度当然是民主的一种，叫做**中国特色的民主**，更具体是以制度化的协商为主要特征的**协商民主**。

本人觉得中国的特色民主的最核心特征其实还不是协商，而是**向人民负责**。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太过口语化，以致让人无法注意到其实它比民主这个概念更有包容性。它可以包容西式民主和中式民主，或者更多样的其它民主。西方也有一个传播极广的民主口号，叫做**民有（of people）、民享（for people）、民治（by people）**。这个向人民负责可以直接或十分近似地相等于民享（为了人民），大体上包含民有（属于人民）的实质。所明显不同者，就是民治，即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人民，**让人民自己来治理自己**。

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使用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了。在华夏的意识形态传统中，与民主最接近的概念是**民本**。其基本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在中国的传统中，人民被称作“苍生”、“黎民”。整体地位极高，人民安居乐业，从来是一切良治的最高目标。但中国传统的确从未把人民视作天下的主权者，认为主权者是抽象的非人格化的“天”，皇帝以“天子”的身份统治天下。但又承认“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自秦以来，虽然君权极盛，但君主的合法性始终或最终还是建立在他能否为苍生黎民提供善治上。

依笔者观察，这个民本主义，已经被当代的中国良好地继承。现实的意识形态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民主的本质。中式的民主，充分地近似于民本**。当然还有发展。这个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协商。就是**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向人民负责，要与人民协商**。

那么为什么不能或不便让人民像西式民主主张和实施的那样通过直接选举和政党轮替，**自己当家作主**呢？这就涉及到下面要讨论的一对更深入的概念：**民意和民心**^[1]

这一对政治学概念比起民本和民主就复杂许多。主要是它们还没有被讨论清楚。

民意好懂，就是通过选举、民意测验、公众舆论等表达出来的直接的公众愿望。民心也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古老政治概念，比如“得民心者的天下”。它表达的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对某一政治势力或政治主张的整体的认可或不认可。实践证明，民意是完全可能出错的。而民心则可靠得多。“得民心”必须“符合**人民的整体长远根本利益**”。因此，

民心应当是人民的整体长远根本利益在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心中的正确映射。

民意在表层，时时变动，是现象。民心则深刻得多，它可以相当于民意的本质。当代的西式民主政治实践表明，它并不能被民众用选票简单地表达。两者之间，经常有着遥远的距离。怎样跨越这个距离，对西方的西式民主政体和东方的民本政体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和考验。

西方的选举民主，太过表面化、太过形式主义，太过追随民众的眼前利益，对选民的平均综合素质要求过高，现在已经陷入明显的困境泥潭。东方的民本主义，则还需要现代化。

人民整体长远根本利益就是民心。如何去把握它，说句实话，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民主理论在极大多数的时间里试图去解析的范围。因为西式民主说来说去也就是要满足民意。但民意（比如总是要求更少的工作时间，更多的福利。）并不一定符合人民的整体根本长远利益。因此这个民心并不仅仅存在于人民的心中。毋宁说，它更应当存在于一些能超越己身局限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或者他们的群体心中。他们肩负人民的重托，在思考中、实践中，在与人民不间断的密切的交流/协商中，慢慢地去摸索寻找这个最符合人民整体根本长远利益的思想体系和施政方略。如果大体找到，他们就能得到民心。

依笔者看，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人类政治追寻民心的两大流派。我们中国完全有资格把民本主义这个流派推向现代化。我们的确不妨把这个现代化的民本主义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民主或协商民主。我以为，这条路追求的实质更应当说是“民心”。或者可不可说是民心主义？

第六节 关于西式民主，关于（政治）制度

先要解释一下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区别。亨氏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后简称《文明的冲突》）^①一书给笔者的第一个教益就是明白了这个区别。

现代化很好理解，就是器物层面的一切进步，就是中国洋务运动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那个“用”。它包括一切物质方面的进步，包括火车飞机轮船电灯电视电话，但却不包括精神，也不包括电视里讲的内容。

那么什么是西方化呢？当然是在精神层面被西方人同化了。一旦彻底完成这个西化，那些非西方文明的人种（比如被自小收养的其他种族的儿童）就除了肤色体型之外，不剩任何自己的东西。概况起来说，西方化就是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制度上被西方同化。对东亚人来说，就是变成香蕉人。（黄皮白心。）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3.

在本书中，经常会用到**西方化**和**现代化**这两个概念。请大家时时记住它们的区别。

笔者绝不否认，现行的西方的以**多党、普选、轮替**为基本特征的西式民主制度在满足一定的基础条件的前提下是一个不错的制度。但鉴于上节所述本人服膺的方法论和本书将详细陈述的大量事实，本人的确并不认为，这种特定的西式民主模式可以或应当“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代而皆灵”。

按理说结论只应当放在本书的末尾。但是为了读者在审阅时，能够提纲挈领，笔者还是打算把本书的部分结论先行披露。就仿佛是先贤胡适所说，先“大胆假设”，然后再“小心求证”。

其实说去说来，西式民主制度要良好地运行，可以简化到只需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因为用这个条件，就可以把人们常说的其它条件都概括进来。比如要有足够的经济发展水平，足够的教育水平，足够的法治水平，足够的公民社会，足够的西式民主习惯……笔者以为，在中产阶级成长到足够强大的过程中，这些东西都会一起成长。还因为**足够**一词也足够模糊，可以让笔者避开一切逻辑陷阱。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大发明家爱迪生的一句名言：“给我足够的金钱，我可以发明任何人需要的任何东西。”如果发明不成功，他总是可以说：“给的钱不够。再给我更多的钱，就会成功。”笔者也自我解嘲一下：如果哪个西式民主政体运行得不好，自己总是可以这样辩解：那里的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

而这个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只能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市中，在工业、商业和文化产业或者说第三产业中生存。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该国/政体必须足够地城市化、工业化甚至第三产业化。在一个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型，甚至倒 T 型的社会中，在一个以手工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落后国家中，在一个还充斥着文盲的国度里，西式的普选民主制成功运行的概率极低。

一个富裕的，呈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是当代在西方盛行的普选民主制度得以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中产的多数选民，才能足够理智，足够稳健地使用他们手中的投票权。而西方当下的许多宪政困局，就来源于这个橄榄型的中产社会背景，由于长年的经济困难，已开始趋于涣散。

有人马上会质问，西方的西式民主制度并不是在社会结构已经达到橄榄型以后才开始发展的。笔者马上就会回答他，在西方社会还不是橄榄型以前，他们推行的政治制度并不是现在的普选民主，而是选举有限制的共和制。

基本上，这个选举范围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而扩大，当中产阶级扩大到超过人口的半数时，普选权就可以实施了。显然他们忌讳的就是占人口多数时的下层人民通过选举制度侵犯创立这个制度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利益。有大量奴隶时（比如 1860 年前的美国南部各州），自由民绝不可能同意人数多过他们的奴隶拥有选举权从而推翻他们

的统治。然后当无产阶级占多数时，有产者们也绝不会接受无产阶级通过投票剥夺他们的财产和特权。

直到中产阶级占了多数，有产者（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两方面）知道通过投票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可能被侵犯了，于是就容忍了普选权。这不是他们今天才看到了普世价值，（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宣布普世人权已经超过 200 年。）而是普世价值直到今天才不会妨碍他们的基本利益了，于是他们就可以让它付诸实施了。

这个本来可以有广泛适应性的制度的关键核心应当是：**无论中产阶级有多少，都必须让他们成为社会的核心，主导力量。当中产阶级远不及人口半数时，就必须想办法为他们的政治权利加权。**

问题是在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已经家喻户晓以后，后进国家已经无法去复制西方用几百年光阴才完成的选举范围逐步扩大的道路，而必须一步到位地去建立直接普选民主。

整个地球的社会结构有没有发展到橄榄形的一天，实在非常可疑。现代西方能在 10 亿人口的规模上，在数十年间，基本建立并维持橄榄形社会，很可能是一个充满特殊先决条件的例外，它很可能既不能被复制，也不能长期维持。换句话说，宝塔形很可能才是永恒的社会常态。我们应当争取的，很可能只是下面那个底座，尽可能地小一点。

西方的普选制度基本都是在那“二战”后的黄金三十年中建立。那个时代，西方经济蒸蒸日上，中产阶级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投起票来，自然温和而稳健。问题是当整体文明态势进入下行通道以后，穷人日增，超过半数。国民投起票来，就会慢慢变得极端。那个时候，普选的西式民主制度就会陷入真正的困境了。

换句话说，**西式民主实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东西，没有足够的各方面的资源，你很难把它玩转。**它真的好像那个莫泊桑写的《钻石项链》，挂在有钱人脖子上的才可能是真的；挂在穷人的脖子上的，只能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也是借来的，过了今夜就必须归还的。

这个制度的最大缺陷或称漏洞，就是它太过挑剔，它对赋予主权的公民集体的素质，有太高的要求。因为现实说明，即使在发达的西方，那些富裕的、有文化的，并且与西式民主制度一起在几百年的时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公民集体，还会时不时地大发神经，做出种种激情冲动、目光短浅的行动或决策。过于强悍的公民集群还太过经常地在街头演出（准）暴力的戏码，用比如阻塞高速公路、瘫痪公共交通，围堵炼油厂等绑架公共利益的方式来替个别社会群体争取权益。而且像**公众贪欲**这样的痼疾，哪怕西方公众再清醒、再反复思考，再反复努力勒紧裤带，至少至今，也没有找到治愈之方，或者是还没有看到一个成功治愈的病例。

这个制度还有其它好些弊端。比如对时间和空间上不在投票场域的人的利益，会被忽视。（比如还未出生或长成的后代必须承担的前辈借下的长期债务。比如外国人甚至

居住在境内的外籍人的利益没有选票代表。)

这种制度对它所依托的社会还有一种特别的苛求，就是**这个社会一定得有足够高的同质性**，一定不可以有**太过僵硬的种族、民族、宗教或教派的对立和冲突**。在这四个方面，都必须有一个占足够优势的主导力量。多党分立，必须在这个主导力量的内部生成。因为，如果不同的党派分别建立这四种之一的极其僵硬而不可能在数年之内改变的对立之上，西式民主的多党轮替必不可行（马来西亚和伊拉克的情形）。如果改变了，那似乎也就永远改不回去。（黎巴嫩和南非的情形。）有幸的是，中国不属于这类情形。

依据从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近年的政治发展/演变中观察到的事实，笔者还发现，作为并非真实独立的政体，它们的各自政治/政体发展会受到它们从属的主权国家的重大牵制/影响/约束。更多或更少地偏向那个主权，都可以成为这种从属政体的内部（西式民主）政治/政体发展的难以撼动的类似上段所述种族/宗教分立的僵硬分野。

据笔者观察，这种制度能够较好地处理的重大社会矛盾，其实只有一种，就是**贫富、或者说阶级矛盾，或者说精英与大众的矛盾**。而且这还要以中产阶级发育到足够强大，或至少握有足够的权利/权力为前提。

西方人最得意的，就是它们的制度能用民权把官权认真地约束起来。这一点当然已经了不起。但笔者以为，这又是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比如承担民粹风险、降低行政效率）才换来的。很抱歉本书不会详细讨论这些代价。那是下一本书的内容。

本节的结论两千三百年前，西方最伟大的学者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给出，他是中产阶级-西式民主基础核心理论的鼻祖。他那笔者认为至今颠扑不破的理论用现代语言概括起来就是下面一段话：**中产阶级是西式民主制度的根本社会基础，同时必须是西式民主制度的主导力量。中产阶级强大，西式民主制度就可以强大。中产阶级弱小，西式民主制度绝不可能健全。只有中产阶级当家，才可能同时照顾到所有阶级的利益。穷人或巨富人当家，都只能导致专制。**

那么什么才是欠发达①国家的理想的政治模式？对此笔者只能暂时提出这样四个原则：**第一、相对于发达西方社会和它们的政治制度，欠发达国家更适合拥有的一定是一种更加倚赖精英、领袖的，更加权力集中的政治制度。第二、这些精英和领袖的权力**

① **欠发达**(underdeveloped, less developed)这个词并不通行，相对**发达**(developed)而言，不够发达之谓。笔者想用这个词来替换现在通行的**发展中**(developing)一词，尤其是当描述的对象是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时。因为发展中只是一个主观的期许，并不是客观的描述。事实上，许多号称发展中的国家，只怕会长时间地停留在欠发达甚或深度的不发达之中而不是在发展中。称它们为欠发达国家，已经客气。真正的**正在像样地发展中的国家**，其实数量相当有限。这是本书将揭示的严酷现实之一。

一样应当受到足够的制度性的约束。（比如禁绝终身制、适当范围的任期、选任制度。）第三、有限发展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应当得到某种形式的适度加权。第四、普罗大众的利益应当得到足够的照顾，虽然本人不主张赋予他们太多、太直接的政治权利。具体的形式则有待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形，自行探索。笔者已经把这种自己推荐的大致模式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加权民主政体**。

为了避免混淆以**多党、普选、轮替**为基本特征的西式民主和其它式样的民主，本书中凡是特指这种西式民主的地方都会无一例外地加上西式这个限定词。在表格中，在一些更加复合的词组中，限于长度，必要时我就用**西民**这个缩略词来代表西式民主这四个字。其实本书对其它样式的新的民主形式也并没有详加讨论。在某些情况下，本书中使用的民主一词也有超出西式民主的更宽泛的含义，这时当然就不会有西式这个限定词。

本书中还会不停地使用**制度**一词。在不会引起混淆的语境下，它特指政治制度。若是指其它的制度，前面一般都会加上定语（比如社会、文化）。

前言的以上部分的核心思想，都成型于 2013 年及更早以前，表达的是那之前本人的思考达到的高度或境界。

自 2014 年初以来，在阅读了一批书籍之后，本人的思想方向有了一个飞跃。关注的中心，论述的立足点，开始从贫富的差异、从中产阶级，向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转移。

本人早已有相当的察觉，在阅读了亨廷顿先生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之后，更进一步地加深了这样一个领会：西方文明和非西方的文明是在相当不同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两类文明。它们不可能完全同质化，在政治方面尤其如此。

笔者倒是赞成亨氏的这个观点：西方的文明，有它独特的价值。这些价值，无法普世，但必须精心地加以保存。（他的言外之意是：西方文明的价值，独特而宝贵。但它们非但不能普世，而且，若不精心保护，还有绝种之虞。——你不相信吧？笔者后面会慢慢更仔细地介绍亨氏的观点。）

也因此，人类社会的将来，很可能拥有多种至少部分不同的政治体制。它们分别更加的适合于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和其它非西方的文明、社会、国家。至于其中的细节，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许多端倪。更多的详情，都要等待将来的历史发展来确定厘清。这方面的论点，本书的许多地方，都会加以阐述；要到总结论之中，才能充分发挥。

第七节 章节安排和主要数据、资料来源

第一小节 章节安排

在最高的层次，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前言当然在最前面。结论当然在最后面。然后还有七篇附录。

正文中间的具体论述则分为三编。

第一编包括第一到第二章。命名为：**绪论**。

第一章：文明概论。解释什么叫文明，我那三个世界和九个子世界的更详细的定义。

第二章：国民素质水平总论。详细的解释本书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国民素质的来由、定义、局限等一系列问题。为后面分析中的大量使用做好准备。本章的第三、第四节还为这个概念提供了第一批的十分雄辩的证据。

第二编是本书的主体部分。用四章的篇幅，把整个地球分为三个世界九个子世界，分区详细探讨。然后又合在一起，反复比较它们的异同。

第三编则是把东方人、东方国家和东方世界在全球的地位再加以更加深入的探讨。

第七章着重讨论了亚裔尤其是华裔在世界各地主要是美国和东南亚的发展成就。该章第五节大量引证美国华裔教授蔡爱眉的《起火的世界》一书中**主导市场的少数民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的观点。这个视角很是独创，对本人大有启发。

第八章是讨论中国在近数十年为什么能越众而出的最详尽的一章。

第九章则分三个层次讨论地缘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没有再涉及国民素质和西式民主。最后的结论分两章，分别讨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

最后还有一个跨越三个世界的，关于发展的总结论。

书末有七篇附录。第一篇相当于一个自传。第二篇到第四篇是自己写的有关主题，但不太方便放进正文的小文章。第四篇到第六篇则是引述的别人的有关论述和自己的评论。第七篇则是一篇纯粹的地缘政治的论文。

第二小节 主要数据和资料的来源

拜互联网之赐，都不去图书馆，笔者就可以查到大批的资料。现在来按照编和章的划分，进一步介绍本书所使用的基本资料，同时解释笔者将反复用到的几个基本概念。

本书的架构，受到两位声名显赫的西方学者的深刻启发。

第一位是英国的堪称伟大的正统史学家汤因比。他关于人类历史最高归类是文明，这些文明如何萌芽、发展、争斗、融合、极盛、衰落然后灭亡的宏伟论述，让笔者茅塞大开，从此挑出了对历史细节的纠缠，而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宏观视野。

第二位是美国的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他研究的主题与本书更切近。他的太多观点都深得吾心。他的最为出名也最为出色的著作《文明的冲突》是本书吸取营养最多的一本。

本书使用的所有概念和数据中，最重要者，的确是那个颇具争议的**国民素质水平**。笔者赫然发现，这个概念可以非常贴切地解释许多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这个概念引自西方学者林恩和万哈林的三本书。对此稍微详细的说明，都会说来话长。在本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就会详加解释。

笔者在本书中引用的绝大部分经济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布的两张大大的电子表

格。其中有从 1960 年到 2011 年每年的 GDP 数字和人口数字。这两个数据一除，我就得到了精确的，与每年的人口数字配套的人均 GDP。

笔者在这三章使用的所有数据中，重要的还有在英国出版的《经济学人》的**西式民主指数**列表。该杂志在从 2006 年起，发表了数份报告中对全球绝大多数有分量的国家(地区)的西式民主化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尝试通过五个方面的分析，利用西式民主指数来量化各个国家的西式民主质量。这五个方面指的是：选举进程和多元化，公民自由，政府运作，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民主指数的分值从 0 分到 10 分。由于本书的必不可少的主题之一是西式民主，必须有一个衡量的指标。《经济学人》给出的这个指标体系是笔者能找到的最完整的。当然它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总之我们要明白，这只是按照西方人的价值规范打出的分数，是他们的分数，借用而已。

这些西式民主指数，感觉有些地方不够公允，好些分数明显带有政治偏见。尤其是它把有关经济方面的指标完全排除在计分体系之外，从而导致好些相当荒谬的评分名次。甚至对一些发达西式民主国家的评分，都会显得苛刻异常。所有这些大不如意之处，遇到时笔者都会特别指出。

至于其它样式的民主，或其它方式的对西式民主的计分，笔者只能说实话，找不到系统的统计资料。没有选择，本人只好在西方人编制的的数据中选择了这一种。

上述四套数据和它们的引申演绎，在本书从头到尾使用。其它的比较局部引入的数据或资料，都会在引入之时，注明出处。

本书前两稿篇幅更巨，使用的数据也要多得多。比如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3 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组成这个 HDI 的**期望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廉洁/腐败指数**、还有根据第一级数据我自行计算出来的第二级数据比如**发展潜力指数**。这里都已至少暂时略去。看以后有必要时，或可再择要补回。

最后，本书使用当页脚注。认为这比在远远的章末或书末排列大量注解对读者方便得多。不过这样也有缺点，就是个别注解过长时，会让相关的表格变得古怪。